

# 多变量分析不等于理论综合

## ——对周方银、王子昌的回应

陈奕平

周方银、王子昌二先生的《三大主义范式可以休矣：论国际关系理论的运用与综合》(以下简称《运用与综合》)对拙文《权力、机制与认同：对美国东盟地区论坛政策演变的分析》(以下简称拙文)提出质疑，批评拙文在进行“三大理论综合”。其实，这是对拙文的误读，将拙文的三变量分析误解为理论综合。

### 一、政策演变的变量分析可以休矣？

拙文提出的问题是：作为霸权国的美国对东盟地区论坛(以下简称 ARF)的政策为何经历了一个从反对到支持的变化过程？笔者以为，权力、机制与认同是研究这一问题的三个重要变量。为此，拙文先介绍了现实主义者、新自由制度主义者和建构主义者对这一问题的解释，然后提出了笔者自己的解释。拙文的结论是：结构现实主义者、新自由制度主义者和建构主义者在解释美国对 ARF 的政策演变方面各有优缺点，所以权力、认同与机制三个变量缺一不可。

---

该文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年第1期。

---

《国际政治科学》2009/4(总第20期),第112—117页。

*Quarterl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国际关系研究的常识告诉我们,当一个变量不足以解释某一国际现象时,可以增加变量,因为一件事的发生“可以有多个变量,它们同时对一个结果产生影响”。拙文正是在分析了三大理论流派的学者对这一问题的解释的优点后,认为权力、机制与认同三者都不足以单独解释美国对东盟地区论坛政策的演变,而应该是三者共同作用的结果。其实,《运用与综合》肯定了笔者做法:“陈奕平的论文主张把权力、机制和认同这三个变量相结合,以解释美国对东亚地区多边安全合作态度的变化,这并非是不合理的思路。”(第96页)也就是说,拙文的命题、写作思路不存在问题。

## 二、多变量分析等同理论综合吗?

《运用与综合》把批评的重点放在所谓“理论综合”上。拙文认为:“结构现实主义看到了大国与弱国权力对比的变化,新自由制度主义者则强调弱国对大国政策的重要性,但二者都忽略了建构主义者提到的认同和社会化的作用,如东盟、澳大利亚和北美等非政府精英对美国决策的影响。”(拙文第33页)这仅仅是就三大流派学者对拙文要探讨的问题所做解释的看法,根本不涉及对三大理论的批判。而拙文综合三大理论解释的长处,也仅仅是借鉴其分析视角,根本无意进行所谓“理论综合”。然而,我不知道为何《运用与综合》认为拙文是在批判三大理论本身,是在进行“理论综合”。其实,《运用与综合》很多时候是在按照自己的理解曲解拙文的思路,比如“我们常常有一种强烈的感觉:这些论文表现了一种倾向,即把权力、机制和认同这三个变量等同于三大理论。”(第89—90页)又如“《分析》一文认为,同时权力、机制和认同来解释美国对亚太多边安全机制政策的演变,是在‘综合现实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范式解释的长处’。这背后的潜台词似乎是说,由于使用了不同理论的自变量,从而意味着使用了这些理论。其中‘强烈的感觉’、‘背后的潜台词似乎是说’等词句都表明,《运用与综合》理解拙文思路和逻辑存在推测和想象的成分,可以说有些断章取义。而《运用与综合》提到拙文‘声称要做出的理论‘综

---

阎学通:《国际关系研究实用方法》,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3页。

合’”(第 92 页)可以说是无中生有,如前所述,拙文无意进行理论综合,更无“声称”一词。

其实,只要认真通读拙文就会发现,拙文不过是借用三大理论来解释美国对 ARF 的政策演变。准确地说,拙文属于理论运用中的历史解释型论文,即“运用理论来解释特定历史事件的原因、形式和结果”,“主要目的是对所描述的事件进行解释”。现将拙文核心内容摘引如下:

……作为霸权国的美国对东盟地区论坛的政策经历了一个从反对到支持再到有限支持的变化过程。现实主义者、新自由制度主义者和建构主义者对此都进行了各自的解释,但各有优缺点。在分析三种范式各自优缺点的基础上,笔者认为权力、认同与机制是美国对亚太多边安全机制政策演变的三个重要变量。

第一,亚太权力结构的变动,尤其是日本、澳大利亚、中国和亚洲“四小龙”地位的上升以及霸权国美国面临的经济不景气和国内孤立主义势力的压力,是影响美国对 ARF 政策的重要因素。

第二,ARF 等多边机制的创建则为美国的政策调整提供了一个很好的选择,地区安全合作机制给美国带来很好的收益,具体体现在安抚东盟、解决一些地区问题甚至“社会化”中国等方面。

第三,ARF 发挥着一系列作用,但美国最初却对 ARF 等多边安全合作机制存在错误认知:一方面,美国担心受多边安全合作机制的约束,影响双边安全同盟;另一方面,美国对 ARF 的作用也认识不足。笔者赞同建构主义者的说法,即加拿大、澳大利亚、东盟和北美非政府精英和盟国官员的“说服”和“社会影响”对美国政策的改变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同时,笔者认为,ARF 机制本身的特征,即强调松散的地区主义、非正式性和一致性原则,也是消除美国对参加 ARF 后会受到极大的约束并影响双边安全同盟疑虑的重要因素。(拙文第 35 页)

关于这一点,《运用与综合》也承认:“它实际是一篇理论应用型论文。”(第 95 页)既然它承认拙文为理论应用型论文,又为何要以“理论提出型”论文来看

---

斯蒂芬·范埃弗拉著:《政治学研究方法指南》(陈琪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版,第 88 页。

待拙文,批评拙文“没有提出一个新理论”(第95页),没有实现“声称要做出的理论‘综合’”? (第92页)

### 三、实证主义分析与解释学方法

《运用与综合》的另一个批评重点是拙文的论证方法:“仅仅提出三个变量,并不能使我们自动地知道,它们与美国对地区多边合作的态度之间存在的到底是什么规律或联系。论文缺少的环节,就是关于这几个变量之间的关系。……它并没有完成自己的任务,即对美国的东亚地区多边安全合作态度变化的原因进行解释。”(第96、97页)

其实,国际关系学研究方法很多,既有所谓科学派的实证主义分析(包括《运用与综合》所提及的计量分析),也有所谓人文派的解释学方法。前者遵循客观世界的规律性、社会科学的客观性以及基于可观察事实的验证等原则。而解释学方法则“注重社会事实的主观性、主客体不可分性和社会科学的价值有涉性”,强调“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只能是理解的方法,即以社会构成的意义和符号网络去理解社会事实和社会现象”。科学派与人文派之争由来已久,但“冷战以后国际关系学界的方法论发展趋势是在中间地带中更多地朝人文方向移动”,其表现就是“从发现和说明客观规律的科学方法到理解主体间意义的解释学方法转向”。

《运用与综合》提出以大量案例的统计分析为前提,建立分析模型,对三大变量的影响进行计量分析,应该说是一个很有建设性的建议。但在一手外交档案尚未公开,难以收集到充足案例资料的情况下,笔者只好采用解释学方法,即借助理论,引用决策者的公开讲话及有代表性的学者的研究成果,解释美国对ARF政策演变的原因。比如,拙文分析权力、机制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时,引用了时任国务卿詹姆斯·贝克的文章、助理国务卿温斯顿·洛德在听证会的证词以及国防部的报告;在论证权力、机制和认同三个变量对美国外交政策的

---

秦亚青:《权力·制度·文化:国际关系理论与方法研究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68—369页。

同上书,第371、372页。

影响时,引用了莫德尔斯基(George Modelski)、克龙(Donald Crone)、伊肯伯里(John Ikenberry)、亨墨(C. Henmer)、卡赞斯坦(Peter J. Katzenstein)、阿查亚(Amitav Achaya)等有代表性的学者就美国对欧洲和亚洲多边安全机制政策的解释;谈到认同时,拙文梳理了美国被社会化的过程。从全文结构看,笔者用了1/5篇幅介绍美国对ARF政策的演变,用了1/4篇幅评述三大流派学者就美国对地区多边合作政策的解释,其余一半以上篇幅论证权力、机制与认同三个变量对美国ARF政策的影响。在杂志限定篇幅的情况下进行这样的论证难道“可以休矣”,还需要长篇大论吗?从前文引用的拙文内容看,笔者论述了三个变量之间的关系,对拙文提出的命题给出了回答,对美国的东亚地区多边安全合作态度变化的原因进行了解释,何以就“并没有完成自己的任务”呢?

至于《运用与综合》提到拙文的一些细节问题,笔者承认确有值得完善之处,但就《运用与综合》提到的部分看法,如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美国实力变化对其外交政策的影响,却有不同意见。《运用与综合》引用结构现实主义的观点,强调“实力在国家之间的分配”,认为“随着苏联解体和冷战结束,美国从‘两个超级大国之一’变成了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其国际地位显著提高,实力地位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第87页)笔者认为,苏联的解体和实力的下降标志着美国对苏联冷战的胜利,美国与苏联(俄国)之间的权力对比出现明显变化,但冷战胜利并未带来美国综合实力的显著提升,相反美国与欧洲和日本等经济体之间实力差距在缩小。因而,拙文的提法是:“笔者认同结构现实主义者的说法,即霸权国美国与地区大国日本、澳大利亚和中国及亚洲‘四小龙’权力对比的变化是影响美国对ARF政策的重要因素。笔者并引用时任国务卿詹姆斯·贝克在《外交》杂志上发表的文章加以佐证。贝克虽然谈

---

参见以下论著: Donald Crone, "Does Hegemony Matter? The Reorganization of the Pacific Economy," *World Politics*, Vol 45, No. 4, 1993, pp. 501-525; George Modelski, "SEATO: its functions and organization," in G Modelski ed., *SEATO: Six Studies* (Melbourn: Cheshire, 1962); John Ikenberry, "Multilateralism and US grand strategy," in Steward Patrick and Shepard Form eds., *Multilateralism and U. S. Foreign Policy: Ambivalent Engagement* (Boulder, CO: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Inc., 2002); Christopher Henmer and Peter J. Katzenstein, "Why is there no NATO in Asia? Collective identity, regionalism, and the origins of multilateralism,"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6, No. 3, 2002, pp. 575-607; Alexander Wendt, *Social Theory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Amitav Acharya, *Constructing A Security Community in Southeast Asia: ASEAN and the problem of regional order* (London: Routledge, 2001)。

到全球层面上美苏对抗的结束,但强调亚洲经济取得“独特的、富戏剧性的”成功,“我们许多伙伴也已成为强大的经济竞争者”;“在新的国际体系中,日本、韩国和澳大利亚等盟友已成为政治和经济方面的重要参与者”。事实上,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美国将日本视为竞争对手、甚至是“敌人”的言论不少,“敲打日本”呼声也经常出现。1990年3月,美国驻日海军少将斯泰克波尔(Henry Stackpole)在接受《华盛顿邮报》采访时,就提出了日本威胁论,主张“美国必须在日本保留军队直至21世纪”,以防止“一个重新武装、复活的日本”东山再起。因此,拙文的结论是:“正是这种权力结构的变化,加上美国国内孤立主义势力的影响,使美国政府不得不对其在亚洲的作用进行重新探索,对其亚洲政策进行适当的调整。”(拙文第33页)

### 四、结 论

笔者非常感谢周方银和王子昌对拙文的批评。《运用与综合》一文提示笔者在写作学术论文时语言要更加清楚和直接,以免引起误读。虽然拙文强调权力、认同与机制是美国对ARF政策演变的三个重要变量,但文中的“现实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者和建构主义者的解释”、“三种范式各有优缺点”等用词,使周方银和王子昌误以为拙文是在对三大主义本身进行理论批判。《运用与综合》提出以大量案例的统计分析为前提,建立分析模型,对三大变量的影响进行计量分析,也是很有建设性的建议。但在一手外交档案尚未公开的情况下,恐怕难以收集到充足的案例资料,尤其是有关决策过程的文献。因此,笔者采取的是解释学方法,引用决策者零散的公开讲话及学界科研成果的结论来论证本人的观点。笔者希望,将来外交文献增多,案例资料更充分的情况下,可根据《运用与综合》提出的分析模型对三大变量的影响进行计量分析。

---

陈奕平:《从“被保护者”到对手:美国政府和民众的日本观》,台北《历史月刊》第161期,2001年6月,第63—69页。

## 作者简介

**吴彤** 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硕士研究生。2002年在南京国际关系学院获英美语言文学学士学位。

电子信箱: tong-wu07@ mails tsinghua edu cn

**张利华** 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教授。1994年在北京大学国际政治学系获法学博士学位。著有:《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2002年)、《中国法治民主建设之路》(2006年)等。

电子信箱: zhanglh@mail tsinghua edu cn

**岳小颖** 上海政法学院教师。2004年在悉尼麦克里大学获国际关系硕士学位,2009年在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获法学博士学位。

电子邮箱: katherineyue@163. com

**王栋**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讲师。2007年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获政治学博士学位。研究兴趣为美国外交、国际冷战史。

电子邮箱: wdong@pku edu cn

**陈冲**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学系 2006级本科生。

电子信箱: nkchenchong@hotmail com

**刘丰**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讲师。2004、2006和 2009年在南开大学分别获法学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译著有《亚洲金融危机的政治经济学》(2009年)。

**陈奕平** 暨南大学历史系和美国研究中心教授。1990年获南开大学历史学硕士学位,2006年获暨南大学法学博士学位。著有:《依赖与抗争:冷战后东盟国家对美国战略》、《人口变迁与当代美国社会》等。

电子邮箱: tchenyp@jnu edu cn

**汪卫华** 上海外国语大学法学院国际事务系讲师,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和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候选人(联合培养)。先后于 1999和 2002年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获法学学士、法学硕士学位。

电子邮箱: wangweihua2008@gmail com